

县域婚姻市场与农村青年的相亲实践

胡静凝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社会与民族学院,北京 102488)



摘要 县域婚姻市场是当地婚姻资源分配与协调的重要平台。社会分层导致婚姻市场分化,建立在个人能力和家庭背景基础上的婚姻梯度序列日渐形成,婚恋机会向上层聚集,中层婚姻竞争激烈,下层则婚恋机会渺茫。基于对农村青年春节期间相亲实践的研究表明,现代相亲模式是农村青年应对婚姻困境的策略性实践,“自由恋爱”融进传统相亲制度,以情感体验为核心的婚恋自主权正在增强。在相亲场域,择偶秩序的理性化和体制身份的壁垒化建构了层级化的“相亲圈”,体制内外农村青年的婚恋选择权及范围呈现出显著差异。在城市情境和消费文化的影响下,农村青年的相亲约会同物质消费挂钩,经济条件既是男青年参与婚姻市场角逐的重要条件,也是衡量其男性气概的最终标准。相亲男女互动交往多遵从传统性别脚本,存在“男财女貌”的文化偏好。农村青年的婚姻嫁娶具有强烈的城市化倾向,县城里的婚房不仅是相亲市场的基本砝码,也是实现个体城镇化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 县域婚姻市场;农村青年;相亲;婚恋自主权;婚姻梯度序列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23)04-0124-11

DOI编码:10.13300/j.cnki.hnwkxb.2023.04.013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婚姻家庭的“祛魅”^[1]借助人口流动和互联网技术,由城市向农村社会蔓延。农村青年的婚恋观念也随之变动,传统家庭主义不断消退,个体化和理性化倾向日益凸显。在普婚型的中国社会里,结婚是个人生命历程中的重要仪式,也是家庭继替的象征,然而适龄人口性别失衡和社会分层加剧,农村青年普遍面临不同程度的婚恋焦虑和婚姻挤压。农民家庭作为“婚姻困难”的直接承受者,必须采取多样化的策略以应对婚恋危机,而县域社会持续走高的相亲浪潮,便是农民家庭主动回应婚嫁难题的日常实践。本文从对春节期间农村青年相亲活动的考察入手,探究现代社会农村青年的婚恋关系及婚恋实践。

打工经济的兴盛加速了农村人口流动,也促使青年婚配对象的选择空间扩大^[2],传统通婚圈被打破,本地婚姻市场被纳入全国婚姻市场^[3]。随着私人生活中“个人”的成长^[4],个体化意识不断瓦解传统婚恋秩序,“浪漫革命”开始出现^[4],爱情取代归属成为婚姻的主导逻辑^[5],农村青年的婚姻模式从婚配向婚恋转型^[6]。但自由与风险相伴而生,消费主义对亲密关系的大肆入侵导致农村青年的婚恋关系呈现“超市化”^[7]趋势,短期化、套路化的“爱情快餐”情势快速崛起^[8]。在现实主义逻辑的指引下,恋爱与婚姻相对分离,物质成为婚恋的前提和保证^[9],对恋爱技术和套路的推崇使爱情陷入被物质殖民的陷阱^[10]。

同时,在经济分化与社会分层的结构性压力下,农民婚姻亦呈现出分层趋势^[11],婚姻市场中阶层分化、地域分化和城乡分异明显^[12]。婚姻资源的不均衡分布形成婚姻压力的逐层传导机制^[13],婚姻市场中女方要价和男方支付相伴而生。性别失衡和年轻女性外流^[14]导致农村适婚人口结构严重失调,稀缺的女性资源占据着婚姻市场的“主导权”,伴随着女性优势地位的确立出现“婚姻市场要价”^[15]。

收稿日期:2022-05-2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发展阶段城市家庭的文化消费实践与形态研究”(22CSH031)。

个体择偶能力和家庭支付能力是农民择偶婚配的两项重要考量^[16],男方的“婚姻支付能力”^[17]决定其在婚姻竞争中的成败,也形塑了以男方家庭财富为核心的“婚姻梯队序列”^[18],婚姻资源向少数以财富为核心的评价体系上层集中。

婚姻市场中的“贱农主义”与城市“拜物教”^[19]对农村家庭产生了严重的婚姻挤压^[20],婚姻成本逐步攀升。“市场元素”对传统婚嫁仪式的渗透^[21]催生了农村地区的“婚备竞赛”^[22],家庭帮衬虽能为高昂的婚姻支付提供动力和保障机制^[23],但“天价彩礼”^[24]也常造成“因婚致贫”^[25]、代际剥削^[26-27]等畸形社会现象。而缺少婚姻资本的农村底层大龄男青年面临更加严峻的婚配困难^[28],甚至有沦为“光棍”的风险^[29-30]。

上述研究均建立在全国性婚姻市场的基础上,从“问题视角”出发讨论婚恋观念变迁、婚姻市场要价和婚姻挤压等现象。但不管是强调结构性因素对青年婚恋的影响,还是讨论农村青年的婚恋自主权,都未能把婚恋实践与生活世界的复杂互动机制解释到位,尚有深入讨论的空间。农村青年的婚恋实践既是全国的,又是本土的,现有研究忽略了对当地社会结构和生活情境的关注,缺少中观的解释机制。男女青年都是婚恋实践的主体,男方并不只是被动地承受婚姻压力,同样女方也不是始终以“要价者”的形象出现,应该重视双方在婚恋实践中的策略性和主体性。对农村青年婚恋现象的研究需要从社会结构和生活世界的互动中求得解释,在“传统—现代”交织的背景下揭示婚配模式变迁背后的复杂机制和实践逻辑。

基于此,本文以“县域婚姻市场”作为分析框架展示农村青年婚恋现状,分析县域婚姻市场的建构、分化与运作机制的同时,将农村青年的婚恋实践放置于相亲情境中进行考察,以便更好地展现婚配模式的变迁,探究城市文化和消费主义对婚恋观念和行为的影响,并从性别的角度分析男女双方在相亲过程中的差异化表现,用于解释农村青年的婚恋逻辑和主体性经验。

本研究所使用的资料来源于笔者在豫南S县的田野调查,调查时间为2022年1—2月,文中所涉地名、人名根据学术规范要求进行了匿名化处理。S县是河南省南部地区S市的下属县城,距市区较近,交通便利,总人口约78.45万人,常住人口49.32万人^①,属于劳务输出大县,常年外出务工人员数量庞大,导致县域社会内部人口流动具有周期性特点。本文主要通过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法收集资料,了解农村青年的婚恋现状、相亲经验、择偶标准及婚恋观念等信息。共访谈了10名农村青年及部分家长,并在调查期间以亲友身份参与观察2场相亲活动。接受笔者访谈的青年均为农村户籍,男女各5名,其中有6位在外务工,4位在县城工作,都有相亲经历,相亲对象皆为亲戚、朋友或同事介绍,均来自S县城及周边农村。

一、县域婚姻市场与现代相亲模式

县域社会内部现代性与乡土性相融合^[31],农民的通婚圈由传统村庄向外扩展,婚姻资源在县域范围内自由流动,县域婚姻市场逐步形成。作为农村青年重要婚嫁途径的“相亲”在市场力量的加持下愈发火爆,因为主要依托于亲缘、地缘关系及熟人网络的扩展和延伸,故在实践过程中也很少超出县域范畴。

1. 县域婚姻市场与本地婚偏好

改革开放以来,外出打工成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也是影响农村青年生命历程的重大事件^[32]。流动迁移不仅从微观层面优化了个体资源、改善了家庭环境,而且在宏观层面上重塑了婚姻市场结构。人口流动的浪潮将跨越遥远距离和文化鸿沟的年轻人聚集起来,原本封闭狭窄的区域、城、乡婚姻市场被打破,全国性的婚姻市场逐步形成。婚姻资源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市场机制推动婚姻竞争全面铺开,婚姻挤压不断蔓延,婚配结果不均质现象随即出现,致使中西部农村青年难以在全国婚姻市场中占据优势,只能求助于本地通婚圈。于是在现代性力量渗透、城镇化建设推进和

① 数据来源于S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

农村社会分化加剧的情况下,“县域婚姻市场”日渐型构。

受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及计划生育时期农村“一孩半政策”的影响,S县人口出生性别比居高不下,“三普”到“五普”数据显示河南出生人口性别比分别为110.30、115.60、118.46^①,这部分人当下刚好步入婚育阶段,性别比例失衡严重。S县经济发展不足,2021年全县生产总值仅为256亿元^②,是一个典型的由消费主导的县城,工业和产业集聚有限,就业吸纳能力欠缺,很难满足广大进城农民的工作和生活需要,人口外流趋势十分显著,相应的婚姻市场上女性资源也随之减少。在性别失衡和人口流动的双重规制下,S县县域婚姻市场内男青年数量远超女青年,女性的稀缺性决定了婚恋选择的相对优势,男方家庭有着更强的婚姻紧迫性和危机感。

现代社会高度流动,随着个体意识的觉醒和对爱情自由的推崇,在消费主义和市场逻辑的渗透下,婚姻的不稳定性逐渐增强。打工背景下“跑婚”、婚变及“重返光棍”^[11]现象频频出现,给农村家庭带来经济和生活上的双重打击,也使得大部分家庭对异地婚顾虑重重,找本地配偶成为一种自我保护策略^[33]。同时农村父母由于活动空间和关系网络比较狭窄、封闭,习惯在传统通婚圈里为子女寻找婚配对象,进一步强化了本地婚的存在感。

“他家大儿子前几年在外面打工谈了一个四川姑娘,长得也好看,白白净净的。他爸不干,嫌远了。媳妇不愿意上这边来。这要去了那边,不跟倒插门差不多。后来再就没遇到合适的,小儿子结婚几年娃都有了,大的还没说好。他妈见人就让人家给她说说媳妇。要说啊,这两口子确实能干,在外面做生意挣了不少钱,家里条件也不差,大儿子长得也好。这一岔儿打过去了,怎么就说不好。”(HGF-W-52)

“对门湾里老王就独个女儿,大学谈了个男朋友,东北的。前几年结婚老王两口子去了,两千多公里,回来老王气的要死,说这个女儿白养了,那么远再也不去了,也不指望享她的福。东北那么远冷的要死,咱这的人不习惯,这疫情都好几年没回来了,可不是白养了。我也就一个女儿,最好能在附近找个婆家,结婚了还能经常回来,在我跟她妈跟前看着也放心。”(HW-M-50)

同时,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和生育观念的转变,农民家庭普遍呈现“少子化”结构,核心家庭内部情感依赖程度上升,代际关系密切,在近距离生活的愿景下,农村父母更加希望孩子能够在本地寻找结婚对象、组建家庭。这不仅便于在婚前了解对方的经济能力、家庭关系以及人品道德信息,而且能够在婚后维系往来密切、资源互惠的亲属网络,有助于降低婚姻风险、维持婚姻稳定。可见农村家庭对本地婚的强烈偏好有着婚姻和睦、生活方便及资源整合的现实考量,而全国婚姻市场无法很好地回应这些需求。

对本地婚的偏好致使县域婚姻市场持续升温,在性别比高度失衡和女性资源净流出的双重压力下,女性的相对稀缺加强了其婚恋选择权,而农村男青年的婚姻竞争压力剧增、婚姻成本攀升。在普婚制的文化传统和家庭继替的思想观念下,农村青年的婚姻意愿不仅没有随着婚姻成本的提升而降低,反而加剧了当地社会的婚恋焦虑和婚备竞赛。

2. 县域婚姻市场分层:婚姻梯度序列

社会分化映射到婚恋领域塑造了县域婚姻市场的分层,而婚姻资源在市场逻辑下分配不均,由此构成婚嫁竞争的动力机制。婚姻资源由多元化的婚恋要素有机组合而成,主要集中为两个方面:一是家庭背景,包括家庭财富、父母工作、家庭负担及社会资本等;二是个人能力,包括工作、学历、收入以及人品、外貌等。家庭背景意味着家庭支付能力,这是婚姻缔结的现实条件;个人能力代表着未来发展潜力,这是婚后家庭经营的保障。婚姻资源的占有情况决定婚恋主体在婚姻市场上的位置和谈判能力,也预示着择偶婚配的话语权和选择权。

人们在婚姻市场中的择偶行为受理性驱动,倾向于选择最具资源优势的人作为婚配对象,以期

① 资料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第三、四、五次人口普查资料。

② 数据来源于S县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

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34]。同质婚仍然是当前社会的主流婚配模式,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显示,在婚姻匹配方面,教育程度匹配、职业匹配、户口类型匹配同质婚的比例均在50%以上^[35]。在县域婚姻市场内,围绕婚姻当事人的个人能力和家庭背景逐步建立起婚姻梯度序列,阶层内婚制、同质性婚配依然延续并占据主流,女性向上婚配较为普遍。在相亲择偶过程中,男女双方的家庭背景追求“门当户对”,个人能力最好也能“势均力敌”。以笔者调查的10位农村青年为例,他们数次的相亲对象基本符合“同类匹配”原则,婚姻建立在物质基础上,基于情感体验的婚恋行为同样受双方家庭背景和价值观念的影响,非对称性匹配易导致不理想的婚恋后果。因此为了提高相亲成功率、规避婚恋风险,媒人常常会根据男女青年的婚姻资源进行配对:

“什么锅配什么盖。说对象也不能乱说,不然人家怨你。家里条件好的,你就要也介绍个好的,不然人家看不中。有正式工作(体制内)的你就要介绍个有工作的,上过大学的就要说个大学生,研究生最好也说个研究生。要不然两个人没得共同语言,谈不来,也结不了婚。”(GX-W-55)

随着商品逻辑对婚姻家庭领域的渗透,择偶婚配中的利益考量不断增加,社会经济地位逐渐成为县域婚姻市场分化的主导因素。在县域婚姻市场中,农村青年根据个人和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分布在婚姻梯度序列的不同层级,婚恋机会向上层聚集,中层婚恋竞争激烈,下层则婚恋机会渺茫。婚姻梯队上层,由有固定工作(体制内)的男女青年组成封闭的内部通婚圈,他们的婚嫁压力较小,婚姻结合容易,且具有向下兼容的主导权;中层主要是在外务工的农村青年,家庭经济条件尚可,但由于人数众多导致男性婚姻挤压,婚姻竞争激烈、缔结成本偏高;而处于婚恋鄙视链最底层的男性存在个人和家庭实力的双重弱势,婚姻备受制约,甚至被排除在婚恋市场之外,被剥夺婚恋的正当权力。在县域婚姻市场中,男性婚恋择偶主要受限于经济因素,而女性的压力则多来自年龄,经济实力不足的男性缺少在婚姻市场上进行资源竞争的资本,年龄过大的“剩女”也难以寻觅到合适的婚配对象,只能被迫降低择偶标准。

“去年谈的那个姑娘挺好的,她家里人不同意,嫌我没有正式工作,她在铁路公司上班,虽然工资没我高,但是她家里人觉得我在工地上,说是个测量主管,只是说的好听,其实就是个农民工。工资说的高又不稳定,不如体制内体面。”(LL-M-28)

“相亲就是这样,你挑别人,别人也挑你。以前姑姑给我介绍过一个对象,在乡政府上班,家里条件蛮好的,城里面的,父母在银行工作。估计是没看中我们家条件,他妈可傲气了。那会我还没调到城里来么,他妈就说等调到城里来再说。后来第二年我就调到县里来了,再想找找我肯定不干啊。”(FJ-W-27)

县域婚姻市场建立在社会分层的基础上,反过来又成为阶层维护和再生产的重要机制。社会竞争和阶层配对助推了婚姻匹配规则的理性化,婚姻梯度与社会流动相互作用。上层农村青年通过优势婚嫁实现了社会资源的强强联合,获得阶层跃升的机会;中层农村青年同样在阶层内部择偶,自身和家庭的发展能力有限,小家庭容易陷入代际循环的“打工”困境;而下层农村青年面临婚姻的弱势积累,婚配困难以至“光棍”,“底层沦陷”的趋势难以扭转。市场逻辑强化了婚姻梯度的存在,阶层内婚配相应的结果就是家庭之间的经济鸿沟扩大、社会不平等程度提高,进而阻碍社会流动通道。

3. 现代相亲模式的出现

随着农村社会变革和文化价值观变迁,农民婚恋转型加速,传统婚嫁模式日渐瓦解,爱情革命推进、自由恋爱兴起。但普遍化的婚姻挤压与弥漫性的婚恋焦虑不断加剧农村青年的择偶困境,新式“相亲”遂成为他们应对婚恋问题的策略性实践,发挥出重要的托底作用。这种模式兼具传统与现代特点,以传统为壳,以现代为里,为个体的婚恋自主权留存了空间。现代相亲模式可归结为“媒妁之言,自主决定”,即依靠传统的择偶媒介挑选婚恋对象,但父母的意见仅作为信息渠道和参考标准,最终决策权掌握在年轻人自己手里,婚姻成败取决于双方的恋爱体验。

现代相亲模式追求的不是“凑合”,而是“缘分”。年轻人对自由恋爱的推崇使爱情成为婚姻缔结的主导逻辑,但现代亲密关系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和个体性,与婚姻家庭追求的稳定性和长期性背道而驰。农村青年对安全感与自由感的双重追求形塑了当下的相亲模式,虽然具有强烈的婚姻目的性,但仍然强调情感体验在婚姻缔结中的重要地位。

“我并不排斥相亲,就怕别人瞎介绍。不过介绍归介绍,我不愿意就不搭理。我妈总觉得我太挑了,但我觉得相亲就像交朋友一样,不可能说见了面就要结婚,我不想要凑合。没有感情的婚姻是不可能幸福的,即使是相亲,恋爱也不能省。没有女孩子不想要甜甜的恋爱吧。”(CC-W-25)

“30岁在小县城里面就算‘剩男’了,爸妈特别着急,让我赶紧结婚。也没少相亲,家里就介绍了三个,一个我爸同学的女儿,我爸妈觉得好,但是我跟她没什么共同语言,聊不到一起。我舅妈介绍的那个吧,谈了一段时间,她比较爱玩爱打扮不太顾家,也没个正经工作,我想找个踏实过日子的女孩子。最近我表姑给我介绍了一个护士,感觉还可以,正在接触。”(YB-M-30)

农村青年以外出务工或教育的途径进入城市生活,个体意识逐渐从家庭束缚中独立出来,随着经济自主性的增强,亲代权力式微而子代权力崛起,父母对子女婚事的参与程度受到限制。相亲打通了男女青年相识的通道,父母可以利用社会关系网络为子女介绍相亲对象,以家庭资源为婚嫁提供物质保障,但年轻人希望摆脱传统婚姻制度的“桎梏”,掌握婚恋态势的主导权。农村父母受城市化生活方式和婚恋观念的影响,同样肯定感情在婚姻关系中的重要性,尊重子女在婚恋择偶中的情感体验和个性化诉求。

“现在当父母的哪个能做得了年轻人的主,你觉得好他相不中也不行啊。我跟他爸催他结婚,他说找不到合适的宁愿不结婚。你说说这是什么话?结婚嘛,说到底还是两个人过日子,两个人合得来才能和和美美的……感情当然重要,强扭的瓜不甜。两个人感情好,家庭才幸福。”(YL-W-54)

在现代社会,父母虽然是婚姻成本的承担者和婚嫁仪式的操办者,但家庭利益在婚恋过程中常需要让位于个体意志,父母原本以“干预”为主的权力配置关系转变成以“付出”为主的资源配置关系^[34]。互联网技术尤其是社交媒体实现了个体的时空“脱域”,相亲双方恋爱交往的空间得以扩展,经济独立性提升了年轻人的恋爱自由,婚恋节奏和发展态势都由男女双方主导,规避了家庭权力对个体婚恋的过渡干涉。

二、相亲图鉴:农村青年婚恋实践

县域婚姻市场的形成和现代相亲模式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相亲活动的进行。春节作为传统佳节是外出务工人员集体返乡的高峰期,县域社会人口密度激增,社交活动丰富,相亲遂成为这一时间段内众多适龄男女青年的主要活动,也间接带动了县城“相亲经济”的红火。

1. 体制内外:群体壁垒下的“相亲圈”

相亲的首要前提是男女双方个人和家庭条件配对,随之而来的是婚姻梯度序列向相亲市场的延伸,生产出以社会经济地位为基础的择偶秩序,在实践操作层面则具体化为职业及经济资本。相亲市场暗藏“鄙视链”,农村青年倾向于在所属的社会阶层中择偶,选择与自身社会经济地位、文化背景等特征相匹配的相亲对象。由此,对婚姻资源的考察构成正式相亲实践的筛选机制,预先根据共识性的择偶标准对双方信息进行理性选择,有助于提高相亲效率和实际成功率。

“问的最多的就是工作收入、家庭情况这些,有没有房子啊,父母是干什么的,家里有没有钱。有正式工作的就好说,女方一般都愿意意见见,再有房有车,选择就更多。难说的就是那些打工的男娃,现在女孩子少。上来就问你在县城买房子没?要是没有的话,那基本上不用往下说。”

所以啊,现在有爱儿子的都往城里买房子。家里条件不好的媒人都不愿意上门,30多岁还娶不上媳妇,只能打光棍,农村这样的也多得很。”(GX-W-55)

在择偶秩序的运作下,婚姻市场的闭环性和圈层化促使活跃在县域相亲市场的农村青年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在体制内工作的适龄男女青年;一类是外出务工者。当地经济发展不足,就业创收机会有限,人们思想观念比较保守,社会价值标准单一,存有强烈的“体制崇拜”,故两类农村青年形成了泾渭分明的“相亲圈”。以公务员为代表的体制内农村青年,工作相对体面、社会地位较高,未来发展前景明朗,在相亲市场备受亲睐;打工青年则受制于相对弱势的个人条件,相亲择偶选择有限。其中女性尚可凭借性别身份和外貌条件占据相对优势,但男性往往需要依靠家庭经济条件的加成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机会。

“大家都习惯在自己的圈子里找,我们单位同事的家属大部分都是公务员、老师、医生这些。你自身条件在这,总不能找个太差的。相亲的时候,如果男方没有正式工作,我肯定不会考虑。不过也没人给我介绍过这样的。”(CC-W-25)

“自从我妈往外说要给我找婆家,就很多亲戚介绍。不过条件都一般般,都是像我这样在外面打工的。我妈想让我小姨介绍个医院的医生给我,我小姨说医院的男医生可抢手了,眼光又高,还能轮得到我?”(ZJY-W-22)

由此可见,相亲市场中不同青年群体的婚恋选择范围和选择权力具有显著差异,不仅呈现出强烈的“体制”偏好,也凸显了择偶秩序中以职业为代表的个人能力的重要性。职业分层深刻地改变了农村青年的自我认同和婚恋意识,直接影响了男女双方的相亲实践,在不同的群体间塑造了差异性的相亲秩序和择偶规则。由“体制”建构的群体壁垒促成了相对封闭的“相亲圈”,资源交换的逻辑和现实主义择偶观在相亲场域愈发鲜明,人们用功利化和物质化的标准挑选相亲对象,甚至决定婚恋态势。深究则可发现,进入体制的农村青年已经实现阶层向上流动,完成社会身份的转变;而打工青年困于“阶层固化”,仍未摆脱“农民工”的标签,二者处境的差异其实是社会分层结构在婚恋场域的象征。

激烈的婚姻资源竞争不断压缩农村打工青年的婚恋空间,个人条件有限故而必须求助于家庭,家庭情况因此成为相亲市场中的重要砝码。年轻人的婚恋生活高度依赖于家庭经济条件,家庭是高昂婚姻成本的最终承担者,在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冲击下,明码标价的相亲场域将男女青年的婚嫁条件简单量化,间接限制了弱势农村青年的相亲机会和选择权,“积贫积弱”的底层男性甚至被挤压出相亲市场。

2. 城市婚恋:以消费为主导的相亲活动

在相亲市场中,媒人首先对男女双方的个人和家庭条件进行配比,如果适配就交换联系方式,并适时安排面对面相亲,“见面”是影响婚恋决策的关键环节。现代相亲模式尊重婚恋的主体性选择,年轻人需要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和了解对方,也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来培养感情,考察对方及家庭的真实情况。

城市生活方式和婚恋文化对农村青年的思想观念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相亲虽然带有传统文化元素,但其婚恋实践和婚恋观念已经现代化。农村青年大多选择县城作为相亲见面点,恋爱约会也都选在县城甚至都市场景中进行,并以城市的恋爱活动和消费模式对标。城市丰富的娱乐消费活动既满足了相亲男女对浪漫爱情的想象,也被当作考验相亲对象的试金石。

“之前那个(相亲对象)是同学介绍的,我同学带着她叫我一起玩。我开车去接她们,就一起吃饭看电影。我没看上,所以后来她再约我,我就没去。现在这个女孩是我表姐介绍的,在网上聊天觉得挺聊得来,见过面之后,也觉得还不错。后来我就带她去W市玩了两天,相处下来觉得还行。”(LL-M-28)

“我姑给把她微信给了我,让我主动点,多找人家女孩子聊天。过年回来才第一次见面,应该还是挺满意的吧,见过面之后就热络多了。就一个星期的假,没什么时间相处。临走时我去

市里坐高铁,就约她一起去玩。无非就是吃饭逛街这些,还给她买了礼物。我让她有空来上海找我,带她去迪士尼玩,她说暑假再去。”(HZ-M-26)

农村青年的婚恋以感情为基础,物质为保障^[36],现代文化既肯定爱情在婚姻家庭中的合法性,也接纳物质作为婚恋的现实基础。相亲实践深受消费主义的影响,强调通过消费建构恋爱的情境和体验,大众媒体和市场经济将“爱情”与消费挂钩,“爱她就给她花钱”,约会被解构成各种娱乐消费活动,如吃饭、送花、看电影、旅游等。恋爱关系的经营和维系被商业文化所塑造,爱意需要在节日狂欢中,通过昂贵的礼物和“甜言蜜语”仪式性地表达出来。恋爱消费在相亲实践中具备合理性与正当性,约会和礼物赠予都有着特定的物质标准,婚恋关系物质化和祛魅化的趋势十分明显。

农村青年的婚恋节奏主要根据打工或者工作周期安排,可用于线下相亲见面的时间有限,因此相亲模式下的婚恋流程缩短、节奏加快。在相亲场域的婚恋逻辑中,感情基础可以培养,而要在短时间内培养感情、建立信任,以消费为主导的恋爱套路和技巧便显得非常重要,这也导致婚恋行为日益货币化。在此基础上,经济条件对农民男青年产生双重意义,既是参与婚姻市场角逐的重要条件,也是衡量男性气概的最终标准。

“现在的女孩子都挺现实的,尤其是相亲的时候。谈恋爱特别麻烦,花钱不说,还要花心思讨好她们,要哄她们高兴。情人节、圣诞节、生日、纪念日,又要送礼物又要送花,还要带她们去吃饭、看电影。女人之间喜欢比较,跟闺蜜比,跟网上比,你不这样,她就嫌你不够浪漫,不够体贴。礼物选的不好,她又觉得你不重视她,不懂她。”(WK-M-24)

可见,褪去甜蜜爱情的外衣,相亲实践背后是男女双方在物质上的交换与合谋。频繁的相亲实践消磨了爱情自由的激情,恋爱关系及通向婚姻的道路都需要由经济基础铺就,甚至需要动用全部家庭资源维系“城市婚恋生活”。那些因社会阶层、经济收入和家庭背景等被贬低和边缘化的男性不得不面对理想型婚恋与现实处境之间的张力,被迫走向情感“将就”和“男性妥协”^[37]，“相亲”场域的情感秩序常伴随着束缚和无奈。

3.“郎财女貌”:相亲实践的性别化差异

传统婚姻家庭制度固守“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社会文化要求女性扮演被动和依附角色,男性则更具主动性,且需要承担养家责任^[38]。这种观念对男女交往习惯影响深远,在今天的两性互动中也常有迹可循,在无意识间“制造性别”^[39]。

在农村青年的相亲实践中,男女双方的相处模式仍然遵照传统性别脚本,男性常在日常聊天、邀请约会以及账单支付中扮演主动角色,确定关系、示爱求婚等婚恋仪式也都由男性主导。女性往往相对被动和羞怯,其“被动”表现深受传统性别规范的影响,主动邀约男性或过于热情与既往从社会化过程中习得的温顺的、依附性的女性角色背道而驰。

“男人嘛,相亲肯定要主动一点。女孩子面子薄,不主动怎么能交到女朋友呢。相亲肯定是该花钱就花钱,不能让人觉得你小气。”(LL-M-28)

“也不是说约会就要让男的全盘买单,主要是态度问题。相亲都不愿意主动花钱的男的,肯定平时也特别抠门。你想啊,他追你的时候,都不愿意给你花钱,以后追到手了,就更不愿意了。”(CC-W-25)

“我性格比较慢热,不太爱主动,而且女孩子太过主动上赶着也不好。女生一般都希望男生主动一点,如果他不主动,说明他对你没那个意思。”(LT-W-26)

这种性别差异同时得到男女双方的默许和接受。男性愿意为恋爱花费买单,既是为了证明自身的经济能力,展示男性魅力,也是在表达成为女性保护者和支持者的意愿。女性在相亲领域愿意遵循传统性别文化,一方面是想以此方式考验男方对自己的心意和付出程度,另一方面也是主动迎合男性对温顺矜持女性形象的想象,满足对方的大男子主义心理,亦能维护由传统性别文化带来的既得利益。

“郎财女貌”是婚姻市场中重要的婚配秩序,男性倾向于将女性看作性客体,而女性倾向于将男性看作社会地位客体^[37]。社会转型促进婚恋转型,农村青年有关情感和理想配偶的规范性话语体系也随之改变^[40]。理想男性的标准是较好的经济条件、不错的外表以及体贴顾家的性格;理想妻子的标准仍然是美好的外貌身材、性格好以及孝顺。在相亲实践中,男性不仅需要在消费领域展示自身的经济实力,更要在日常生活中适时表达对女性的关心体贴,善用“甜言蜜语”讨女孩子欢心。而女性则会通过外貌妆容、服饰穿搭对身体资本进行主动、直接的展示,满足“男性凝视”,迎合相亲择偶场合对“女貌”的客观要求。

“那姑娘真的不行,那天我们一起吃饭,我一见面就不喜欢。真的太胖了,个头也不高,穿一身黑衣服,打扮得也老气。我妈看照片,直摇头,说还没她穿的鲜亮。我不喜欢太胖的女生,稍微胖点也没事,但真的太胖了。”(LL-M-28)

“一家有女百家求”,女性在县域婚姻市场中拥有更大的婚恋选择权和“退出权”^[41],是整个婚恋态势的主导者,也是婚恋成败的最终决定者。婚恋市场的现状改变了人们对农村青年婚恋的性别化认知,男方和男方的家长常被议论“也别太挑了!有个差不多的就行了”,但是女方和女方的家长却抱着“趁着年轻多挑挑!结婚是一辈子的事!不能随便”的想法。适龄婚恋人口性别比失衡为农村女性在县域婚姻市场的博弈中提供了筹码,并逐步确立她们在相亲、婚恋实践、婚嫁仪式乃至家庭关系中的优越地位。但这种“依附性支配”^[42],只是相对于婚姻鄙视链中下层的农村男性而言,而那些社会经济地位优越的男性仍然拥有相当大的婚恋自主权。

4. 婚嫁城市化:县城里的婚房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大量农民外出务工经商,家庭资源积累增加,农民热衷于向县城流动并买房定居。近年来,S县县城不断扩展,常住人口迅速增加,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日益繁荣,就业、医疗、教育以及公共服务等条件不断改善。大量农民家庭进城购房、定居的普遍性事实支撑起县城房地产市场的繁荣,由婚姻推动的购房需求因此成为县域城镇化的重要驱动力。在调查中,笔者听闻不少农村男青年在未进城购房之前相亲屡屡失败,而购房之后成功找到对象、顺利完婚的事例。在县城购置婚房成为农村青年参与婚姻竞争的门槛条件,也是婚姻市场中媒人说项谈判的基本砝码。

“之前没买房子,儿子说亲,说一个也说不好,说两个也说不好。上来就问你在县城有没有房子,没房子连谈都不用谈。连媒人都不愿意上门,后来买了房子,一下子就说好了。”(WX-W-56)

“年轻人不愿意住农村,儿媳妇也不愿意跟老人住。现在孩子少,就这一个儿子,儿媳妇家里也一个,当时结婚,他老丈人说反正你们家也没房子,我们有,要不就来我这结吧。我跟他爸一听,这哪能行,赶紧凑钱把房子买了。”(ZY-W-50)

中国传统的婚姻家庭制度要求父系继嗣和从夫居,这种思想观念延续至今,在农村地区尤其如此。从夫居的婚居安排意味着男方家庭有义务为新婚夫妻提供婚后的生活居所,现代社会的婚嫁标准提升到农村家庭必须在县城购买婚房。农村青年在离开学校后基本都进入非农领域就业,生活环境早已脱离农村社区,受城市文化浸染,其生活习惯、消费方式以及思想观念都已向城市靠拢。同时,在农村居住亦难以满足“小家庭”的日常需求和发展需要。于是,年轻人借由婚姻向县城转移便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虽然我俩都在乡里工作,但这婚房肯定是买在县城里,开车去乡里也就半个多小时,每天上下班来回也方便。我虽然工作多住在医院,但轮休的时候肯定也想要回家住。乡下干啥都不方便,想要逛街吃饭玩,钱都花不出去。我们单位的同事都是在城里买的房子。再说我俩以后肯定是要想办法往城里调的。”(FX-W-25)

“没有房子就结不了婚,之前相亲的时候,女孩问我县城有没有房子,我说暂时还没有,但结婚肯定会买房子。人家就觉得你是骗人的,只是说说,谁知道会不会买。后来贷款买了房子,相

亲时,女方就会问在哪里买的,什么样的房子,房贷多少,谁来还。”(TYM-M-26)

随着在村庄文化价值体系的转型,为儿子在县城买房已经成为父母新的人生任务,即便不能全款买房,至少也要凑齐首付按揭买房,有儿子的家庭不得不提早攒钱,最好能在儿子步入婚育年龄前就预备好。为儿子买房的父母能够得到村庄舆论的肯定,获得面子和道德资本,否则将被村民议论是“没有能力”和“不负责任”的父母,就连儿子都会对他们产生怨怼。

“我同学爸妈都在城里买房子,我爸妈就是不买。每次都说买买买,肯定买,就是嘴上说说,也不行动。我都说了家里出首付,房贷我来还,他们就是不拿钱。明明手里有钱,也不是没有。每次都说结婚就买,连房子都没有结什么婚。”(HZ-M-26)

“原来村里的房子也是没两年盖的,离城里也近,但在农村。现在女方要求都高,年轻人肯定相不中,想住城里。这个房子是17年买的,装修当时也花了不少钱。三室两厅,学区房,全县最好的小学初中高中都在这附近。买房子借的钱都还的差不多了,房贷平时都是我在还,这都不需要他们管,只管住就行了。今年还买了个车,都是为娶媳妇准备的。”(LY-W-55)

县城里的婚房提供了城市生活的“入场券”,也为小家庭创造了独立居住条件,满足年轻人对高质量生活的要求和城市文化的向往,帮助他们以婚嫁为契机,推动个体城镇化的进程。农村家庭的城乡迁移需要代际合力来完成,年轻人进入城市定居生活、摆脱农业身份,是家庭实现社会阶层跃迁的希望。但高昂的城镇化成本也给家庭带来沉重负担,这并不意味着代际责任的终结,而是预示着父母为小家庭进一步提供物质和劳动双重辅助的开始。

由此可见,农村青年作为“循环性移民”^[43],社会化过程深受城乡两种文化的洗礼,导致其婚恋实践往往需要在现代性和传统性之间做出妥协后才能寻得最终的平衡。他们向往城市浪漫的自由恋爱,又常因现实的拮据不得不求助于传统婚姻家庭制度;既追寻情感秩序在婚恋实践中的主导地位,又被迫陷入婚恋市场的物质殖民。

三、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县域婚姻市场的视角,深入现代相亲模式背后的逻辑转变,旨在从社会结构和生活世界的互动中探讨农村青年的婚恋实践及其主体性体验。县域婚姻市场内的“圈层化”现象日益显著,农村青年个人及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其在婚姻市场中的位置和权力,择偶婚配虽有基于资源交换的理性考量,但也包含对自我情感的策略性追求。市场逻辑对婚恋秩序的渗透使得男女双方的主体性日益受到威胁,男性承受沉重经济负担的同时,女性也面临被商品化的风险,婚恋实践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摇摆,婚恋关系在物质与情感的夹缝中求生。

既有的婚姻市场理论立足于富有流动性的全国婚姻市场,预设了一个没有实体边界的婚恋场域的存在,但实际上受社会结构、地域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家庭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农村青年的择偶问题既是全国性的,又是本土化的,全国婚姻市场框架下仍然存在区域性的、地方性的婚姻市场。这些基层婚姻市场与全国婚姻市场相互开放,但也存在隐形“壁垒”,人口流动架起远距离自由恋爱的桥梁,但婚姻资源的非均衡性催生了本地通婚圈的内卷。本文对农村青年婚恋问题的分析表明,县域婚姻市场建立在地缘性婚姻的基础上,是当地婚姻资源分配与协调的重要平台,服务于县域青年男女的婚恋需求,既构成解决农村青年择偶困境的保护机制,又刺激了婚恋焦虑的蔓延和婚姻成本的攀升。

县域婚姻市场的变革是社会转型在婚恋领域的投射,个人故事与宏大叙事交织,人口流动、性别失衡、社会分化以及商品经济等结构性张力在向农村社会传递的同时,开始影响农村青年对于亲密关系、婚姻及家庭的个体选择。当前县域社会火热的相亲现象实质上是农村青年主动应对婚姻挤压和择偶困境的产物,但其婚恋自主权仍然受制于社会分层和市场竞争结构,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倾向,相亲实践中的理性化匹配、物质化消费、性别化实践以及城市化需求都彰显着婚姻家庭的功能性和工具性意义正在逐步增强。

参 考 文 献

- [1] 吴小英. 婚姻的“祛魅”与家庭观的位移[J]. 探索与争鸣, 2013(5): 18-20.
- [2] 曹锦清, 张乐天, 陈中亚. 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M].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1: 332.
- [3] 杨华. 代际责任、通婚圈与农村“天价彩礼”——对农村彩礼机制的理解[J]. 北京社会科学, 2019(3): 91-100.
- [4] 阎云翔. 私人生活的变革: 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9: 97.
- [5] 杨华, 王会. 从归属到爱情: 农村年轻女性婚姻逻辑的变迁[J]. 中国青年研究, 2017(10): 64-72.
- [6] 何倩倩. 从“婚配”到“婚恋”: 婚姻模式变迁与农村光棍形成——基于关中L村的实地调查[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1): 130-136, 169.
- [7] 叶青. 当代中国青年亲密关系的“超市化”转型——基于婚恋杂志的历时性比较[J]. 当代青年研究, 2014(6): 100-106.
- [8] 宋丽娜. 流水线上的爱情快餐——以在富士康郑州厂区的调研为例[J]. 中国青年研究, 2019(7): 78-83, 43.
- [9] 王旭清. 婚恋现实主义: 农村青年婚恋的表征、逻辑与实践[J]. 当代青年研究, 2021(4): 31-38.
- [10] 宋丽娜. 婚恋技术主义: 农村90后青年的婚恋实践[J]. 中国青年研究, 2016(9): 38-43.
- [11] 宋丽娜. “重返光棍”与农村婚姻市场的再变革[J]. 中国青年研究, 2015(11): 84-90, 108.
- [12] 胡小武. 城镇化之乡愁: 青年婚恋市场的地域分化与城乡分异[J]. 中国青年研究, 2017(2): 22-27.
- [13] 王晓慧, 刘燕舞. 农村大龄青年婚配困难问题研究——社会剥夺的视角[J]. 中国农村观察, 2017(2): 117-129.
- [14] 许加明, 魏然. 男性新生代农民工的择偶困境及结婚策略——基于苏北C村的调查与分析[J]. 中国青年研究, 2018(1): 56-63.
- [15] 桂华, 余练. 婚姻市场要价: 理解农村婚姻交换现象的一个框架[J]. 青年研究, 2010(3): 24-36, 94-95.
- [16] 王向阳. 姻缘难觅: 转型期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婚配危机及其解释——基于关中扶风X村的田野调研[J]. 兰州学刊, 2020(11): 162-171.
- [17] 李永萍. 北方农村高额彩礼的动力机制——基于“婚姻市场”的实践分析[J]. 青年研究, 2018(2): 24-34.
- [18] 陈文琼, 刘建平. 婚姻市场、农业剩余与光棍分布——一个理解农村光棍问题的中观机制[J]. 人口与经济, 2016(6): 10-20.
- [19] 刘燕舞. 婚姻中的贱农主义与城市拜物教——从农村光棍的社会风险谈起[J]. 社会建设, 2015(6): 53-69.
- [20] 杨华. 农村婚姻挤压的类型及其生成机制[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4): 25-34, 170.
- [21] 王敬, 海莉娟. 婚姻市场分层化与公共仪式市场化——陕西关中地区农村青年婚嫁的运作机制[J]. 中国青年研究, 2018(6): 53-58, 111.
- [22] 王向阳. 婚备竞赛: 共识、策略与行动——理解华北农村婚恋压力的一个中观机制[J].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5): 20-28.
- [23] 陈秋盼, 王海平, 康丽颖. 家庭帮衬: 农村青年婚姻中高额彩礼的形成机制分析[J]. 当代青年研究, 2018(5): 48-53.
- [24] 靳小怡, 段未清. 天价彩礼源何来: 城镇化下的中国农村男性婚姻成本研究[J]. 妇女研究论丛, 2019(6): 18-31.
- [25] 刘成良. 因婚致贫: 理解农村贫困的一个视角[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3): 37-44, 153.
- [26] 王德福. 变色的嫁衣: 作为代际剥削手段的彩礼——转型期农村彩礼习俗的性质嬗变研究[J].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2): 26-30.
- [27] 陈锋. 农村“代际剥削”的路径与机制[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2): 49-58.
- [28] 贾志科, 沙迪, 朱鹏举. 农村大龄青年的择偶压力及社会风险——基于华北九个村落的实地研究[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5): 140-147.
- [29] 余练. 婚姻连带: 理解农村光棍现象的一个新视角——对鄂中和鄂东三村光棍成窝现象的解释[J]. 人口与经济, 2017(1): 13-21.
- [30] 费尔德曼, 靳小怡, 刘利鸽. 婚姻挤压下的中国农村男性[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2.
- [31] 王春光. 对作为基层社会的县域社会的社会学思考[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1): 1-11.
- [32] 风笑天. 农村外出打工青年的婚姻与家庭: 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领域[J]. 人口研究, 2006(1): 57-60.
- [33] MA E, CHENG H L. “Naked” bodies: experimenting with intimate relations among migrant workers in South Chin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005, 8(3): 307-328.
- [34] KALMIJN M. Assortative mating by cultural and economic occupational statu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4, 100(2): 422-452.
- [35] 康慧琳, 孙凤. 择偶方式与青年婚姻匹配[J]. 青年研究, 2022(4): 81-93, 96.
- [36] 宋丽娜. 婚恋转型: 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实践[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 88, 169.
- [37] 李玉萍, 彭钢旎. 男性妥协: 中国的城乡迁移、家庭和性别[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
- [38] CATER M, LLOYD S A. Courtship[M]. Newbury Park, CA: Sage, 1992.
- [39] WEST C, ZIMMERMAN D H. Doing gender[J]. Gender and society I, 1987(2): 125-151.
- [40] YAN Y X. Private life under socialism: love, intimacy, and family change in a Chinese village, 1949-1999[M].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41] 李永萍. 婚变:农村妇女婚姻主导权与家庭转型——关中J村离婚调查[J]. 中国青年研究, 2016(5): 86-92.
- [42] 陈峰. 依附性支配:农村妇女家庭地位变迁的一种解释[J]. 西北人口, 2010(1): 83-87, 94.
- [43] FAN C. China on the move : migration, the state , and the household[M].New York:Routledge, 2008.

County Marriage Market and Rural Youth's Blind Date Practice

HU Jingning

Abstract County marriage market serves as an important platform for the distribution and coordination of local marriage resources.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rural areas has led to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marriage market, resulting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marriage hierarchy based on personal ability and family background. Opportunities for marriage and love tend to concentrate at the upper level, while fierce competition characterizes the middle level, and the probability of marriage and love is slim at the lower level. Research on the dating practice of rural youth in S County in southern Henan during the Spring Festival shows that the modern blind date model is a strategic practice for rural youth to navigate the challenges of marriage. It combines “free love” with the traditional blind date system, and autonomy of marriage and love with emotional experience as the core is being strengthened. In the field of blind date, the rationalization of mate selection order and the barrier of institutional identity have constructed a hierarchical “blind date circle”.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power and scope of matchmaking choice of rural youth inside and outside the establishmen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urbanized practice and consumer culture, the blind date of rural youth is linked to material consumption. Economic conditions are not only an important condition for young men to participate in the marriage market competition, but also the ultimate measure of masculinit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en and women mostly adheres to traditional gender roles, and there is a cultural preference for “male wealth and female appearance”. The marriage practices of rural youth exhibit a strong tendency of urbanization. The marriage house in the county serves not only as a fundamental factor in the dating market, but also an important way to realize individual urbanization.

Key words county marriage market; rural youth; blind date; autonomy of marriage and love; consumerism

(责任编辑:余婷婷)